

关于圖書分类法基本序列 与標記符号問題的討論

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在圖書分类法基本序列中先后問題的商榷

武宁生

圖書分类法最基本的問題之一是它的基本序列。我們面臨着的任务是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創立一种大型圖書分类法，因此，深入探討分类法的基本序列，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圖書分类表的基本部类問題，目前在圖書館界基本上已取得了一致的意見，認為必須分为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綜合性圖書五大部类，即所謂“五分法”。但在它的基本序列的安排方面，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孰先孰后的問題还没有得到最后的解决。关于這個問題的爭論，早在几年以前就开始了。“中小型圖書分类表”虽然确定社会科学在前，然而到現在为止，还有许多同志对这样处理抱有不同的看法。因此，这次一开始討論大型圖書分类法的基本序列时，立即又从新开展了对这一問題的爭論。

我們知道，苏联圖書館界对这一問題的爭論曾相持了很長的时间。苏联統一圖書分类法的最初方案是将自然科学列在前面的，而1953年的方案又将社会科学提到自然科学之先。其后在圖書館界就广泛地展开了爭論，特别是1957年，爭論达到了新的高潮。通过广泛而深入的討論，1958年終於做出了最后的决定，仍将自然科学排在前面，然后才是整个社会科学部类。有关苏联圖書館界对这一問題的爭

論的主要材料及決議，在我国圖書館学刊物上均已介紹过了。

从苏联圖書館界对这个問題的爭論，以及目前我們存在着的分歧来看，我們應該正視这样的现实，即爭論双方都是以圖書分类法的政治思想性作出发点，两种方案都各具有其优点，但同时又都存在着一些不可克服的缺陷。而这些缺陷产生的原因，又主要在于圖書分类的单綫排列的局限性，及其与分支科学分类之間的矛盾。要想彻底解决这一矛盾，从而創造出完美无缺的圖書分类法单綫排列的序列，看来是难于达到的。我們認為，目前應該把問題轉向于研究到底哪一种方案比較更适合一些。

爭論的双方都一致認為圖書分类应以科学分类为基础。那么，就讓我們看看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作家关于科学和知識分类的指示吧！

恩格斯早在“自然辯証法”一書中就曾指出，科学分类应以物質运动形态的轉化作基础，科学的排列是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科学。

毛主席在“整頓党的作风”一文中这样写道：“世界上的知識只有兩門，一門叫做生产斗争知識，一門叫做階級斗争知識。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門知識的結晶，哲学則是关于自然知識和社会知識的概括和总结。”在“实践論”一書中，毛主席又明确地指出：“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認為人类的生產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它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認識，主要地依賴于物質的生產活动，逐漸地了解自然的現象、自然的性質、自然的規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經過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漸地認識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知識，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

此外，Б·М·凱德洛夫院士在他“論科学的分类”一文中，論証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分类原則，并在这一基础上拟定了一个单綫的科学分类序列。在这个序列中，自然科学也是列于社会科学

之先的。

遵循恩格斯和毛主席的指示，根据凱德洛夫所拟定的分类方案，我們可以断言，在科学分类的总系列中，自然科学列于社会科学之先是无可質疑的。

主张社会科学在先的人，往往以图书分类不同于科学分类这一点作借口，企图以此作为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原有位置加以倒置的原則基础。其实，誰都知道图书分类与科学分类是有差别的，主要差别在于图书分类单线排列的人为性，在于图书分类有着自己特有的对象。但是，我們認為，这些差别不是原則性的差别。因此，在图书分类法中应该最大限度地遵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分类原則。

我們認為，在基本序列問題上，图书分类与科学分类的差别只能在下列两方面：第一、在图书分类法中，以馬克思列宁主义大类作为整个序列的开始，以体现出它的主导作用和分类法的指导思想；第二、根据图书出版的具体情况，建立一个“綜合性图书”大类。除此以外，再不应该以任何借口任意违反科学分类原則。研究了主张社会科学在前的人所提出的方案，我們不禁要問，他們所承認的“图书分类应以科学分类作基础”这一原則，在他們所提出的关于基本序列的方案中到底体現在什么地方呢？

蔣一前等同志的“图书分类表五分法中社会科学在自然科学之前的看法”一文，可作为上述那些意見的一例。在这篇論文中，著者避而不談图书分类与科学分类的相互关系，避而不談恩格斯和毛主席的那些精辟指示，而只是简单地論証了这样两种理由：一是图书分类較之科学分类更富有階級性，二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社会科学三个部类不可分割。

我們認為，这些理由是缺乏論据的，因而也不能构成要把社会科学提前排列的理由。

首先，我們来談談第一个問題。蔣一前等同志認為图书分类富有强烈的階級性，因此在編制图书分类法时，在运用科学分类原則上不能墨守常规，而要考慮它的政治思想要求。必要时运用反排、倒置及突出等方式来体现重要的部分（从全文看来，著者認為社会科学似乎比自然科学重要些）。这一論点是似是而非的。在这里应该弄清两个問題：

一、分类法的政治思想性問題。由于作为宣传

和輔導閱讀工具的分类目录将在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无疑地图书分类法必須具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但是，根据科学分类原則編制的图书分类法，以及在分类法基本序列中自然科学位于社会科学之先，是否就不具备这些条件了呢？要知道，我們編制图书分类法所依据的，既不是孔德或斯宾塞的科学分类，也不是培根或其他人的科学分类，而是依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分类。由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分类反映着辯証唯物主义的观点，因此这种分类法本身也就具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列宁曾經說过，“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謂党性”。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1卷，379頁）。从蔣一前等同志的論文中可以看出，他們忽略了这一点，而認為科学分类的階級性似乎不如图书分类的階級性强。其实，这是他們把（辯証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和階級性对立起来了。大家知道，馬克思列宁主义要求把科学性和党性紧密地結合在一起。

二、图书分类法里反映学科的重要程度問題。

在蔣一前等同志的論文里，提到运用反排、倒置及突出的方法来体现重要学科和重要問題的作法，也是值得商榷的。在这里，我們姑且不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哪一門重要，哪一門次要（我是同意袁湧进等同志的意見的），而只研究如何反映的問題。图书分类法是應該突出地反映那些重要的和具有现实意义的材料。但这并不等于說，所有学科都要按它的重要程度和现实性来排列順序。当然，上述那些方法在处理个别类目时（如“政治、社会生活”大类中的“国家制度”）是可以采用的。但是这种方法本身既不是图书分类法的一般原則，更不是图书分类法的重要原則。因此不能任意运用于任何类目，其中也包括基本序列的类目。如果硬要把学科按重要性的程度来排列，那么根据厚今薄古的方針，“历史科学”大类就不能按照社会发展过程来排列，而是将現代史排在第一位，然后是近代史，最后才是古代史了。在技术科学部类中，今天以鋼为綱，鋼鐵工业排在第一位，明天机械元帅升帐，又必須将机械工业提前。如果这样处理，那么科学分类原則又如何貫徹到图书分类法里来呢？这不但不能使分类法具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反而会給图书分类和目录組織造成混乱。根据我們的理解，图书分类法的政治思想性不應該用这些方法来体现，而應該体现在它是否符合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則和科

學的客觀聯繫上。

其次，我們再來研究一下蔣一前等同志的第二種理由，即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和社會科學不可分割。其實豈止這三部門不可分割，哲學和自然科學、馬克思列寧主義與自然科學同樣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聯繫。第一、馬克思列寧主義是關於自然界和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的科學，可見它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都有密切的聯繫；第二、“哲學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概括和總結”，因此也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有着同樣密切的聯繫。除此以外，“自然科學本身需要方法論的指導，需要使用概念的本領，而這種本領正象恩格斯所說的，只有借助於哲學的研究才能得到發展”（弗·凱列和莫·科瓦里仲：“思想體系和科學”。載“學術譯叢”；1959年，5期，1—6頁）。列寧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一書中也深刻地闡述了自然科學同唯物主義世界觀的密切聯繫，並且在“論戰鬥的唯物主義的意義”一文中，還提出哲學和自然科學的聯盟。由此可見，所有知識部門都有聯繫，但在單線分類排列中又不得不將它們劃開一個缺口，很自然地這個缺口應該是在哲學和社會科學之間。

蔣一前等同志在他們的論文中特別強調，由於哲學中包括着歷史唯物主義，而歷史唯物主義是辯證唯物主義在社會領域內的具体應用，它只與社會科學密切聯繫着，而與自然科學并無這種聯繫，因此得出結論：社會科學必須緊跟着哲學。這種意見是不能同意的。誠然，歷史唯物主義是把辯證唯物主義的原理推廣去研究社會生活現象，運用去研究社會。但是我們考慮這一部類和那一部類學科的聯繫，是從它們整個的角度全面考慮的，即整個哲學同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聯繫，不能只看到歷史唯物主義與社會科學的個別聯繫，而忽略哲學同自然科學的整個聯繫。反過來說，與哲學類中某些學科有聯繫的也并不只是上述一點，我們知道邏輯學在哲學大類中一般都是占據末位的，那麼，它通過數學邏輯學，過渡到自然科學部類，而與數學連接起來，豈不是很好嗎？

另外還有人說，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位置先後的問題，也就是以政治為主或是以技術為主的問題，並認為自然科學在先是“不問政治”、“純技術觀點”的表現，只有將社會科學列在自然科學之先，

才能体现出技術必須服從政治的精神。我們認為，這種說法和想法至少也是片面的、狹隘的。正因為我們認為科學技術是不能脫離世界觀的，所以才主張它在分類法中應該緊接着哲學部類，而不容忍它與馬克思列寧主義大類和辯證唯物主義脫節，以体现出它受着一定的世界觀的支配。

如前所述，無論主張自然科學在先抑或主張社會科學在先，都是從圖書分類法的政治思想性出發的，根本不存在效仿資產階級圖書分類法的情況。然而目前有些人在主張社會科學在前的同時，却硬說資產階級圖書分類法大多是自然科學在先，因而指責我們的主張是追隨資產階級的圖書分類法。那麼，我們就有必要略為談談這個問題，以便弄清真象。目前資本主義國家最通行的三種分類法：杜威十進分類法、美國國會圖書分類法、國際十進分類法，沒有一個不是自然科學位於社會科學之後的。其餘比較著名的資產階級圖書分類法，如克特“開展分類法”，布朗的“主題分類法”以及“冒號分類法”等等，有的是自然科學在先，有的是社會科學在先。再看解放前我國幾部主要的分類法，除劉國鈞的“中國圖書分類法”外，其餘如杜定友、皮高品、洪有豐以及何日章、袁湧進合編的分類法等，都是將社會科學列在前面的。由上述實際材料可見，指責我們追隨資產階級圖書分類法的根據，是建立在不真實的基礎上的。

最後，主張社會科學在先的人還有一種臆想，認為他們的方案能使分類法便于使用。對這種看法，我們還是援引凱德洛夫的一段話來作答復，同時也作為本文的結束語：“分類法應當有一個十分明確的基礎，決不能只是從便于使用出發而隨意編制。當然便于使用的要求是必要的，但是決不能把它當作原則用來代替理論原則，因為理論原則是我們編制分類法的基礎和出發點。分類法應當首先在它的基礎和出發點上是正確的，那麼，它也就會是便于使用的，不但如此，並且這不是一般的方便，而將是最大的方便。若分類法基礎是偶然的和隨便的，那麼，它的方便程度也是有限的；即使在某一點上方便了，而將在其它很多方面是不方便的，將使圖書館工作人員的工作感到困難。分類法的實用方面是取決於它的理論基礎的。”